

俄羅斯媒體與政府角色

吳非

1991年12月27日俄羅斯聯邦的人民代表大會^①與最高蘇維埃^②審理通過新的《大眾傳播法》，最後經俄羅斯聯邦新任總統葉利欽(Boris Yeltsin)簽字生效。俄羅斯傳媒法的制訂，基本上延續了葉利欽在前蘇聯時期對於新聞傳播改革的基本構想，該法不但奠定了俄羅斯聯邦今後新聞媒體發展的基調，而且聯邦政府更加強調憲法保障人民思想與言論自由的責任^③。當時俄羅斯聯邦政府主要是為了強調現在俄羅斯聯邦與整個蘇聯的各種具體區別。

一 媒體獲得自由但失去資金來源

《俄羅斯媒體法》屬於聯邦法的一部分，在俄羅斯政治體制轉形期中，該法的頒布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俄羅斯聯邦內新聞傳播事業的蓬勃發展，但也導致政權、媒體與經濟改革之間產生了不可協調的新矛盾。表面上看，聯邦內的新聞檢查制度取消了，國家不再直接監管媒體，但實際上中央政府與企業都可以以股份的形式直接參與經營與管理媒體事業。而媒體發展急需龐大資金，如前獨立電視台總經理基辛廖夫(Yevgeni Kisenleov)曾在總結節目中說明，該電視台一年的運作經費為二至三億美元，私有制下發展起來的新型銀行家正好擁有媒體所需的資金。大企業經理人與銀行寡頭對於媒體的經營與管理，取代了蘇聯時期中央政府對媒體的操控，大眾傳播媒體開始以商業經營形式影響並重新塑造社會輿論，這樣國家在執行與制訂對內、對外與經濟發展的政策時，媒體便以商業取向及背後的財團來監督政府政策的執行，這使得政府在處理與媒體的關係時，經常陷入法律與經濟現實的兩難窘境。

按照頒布的媒體法，除了國家通訊社「伊塔—塔斯社」與《俄羅斯報》由中央預算補助之外，其他媒體都需自負盈虧，這意味着今後大部分媒體產業不再由政府直接補助。沒有政府奧援與財團支持的媒體基本上已經失去生存空間，這其中之主要原因是：在前蘇聯轉型期後，俄羅斯媒體並沒有形成一支直接面對

《俄羅斯媒體法》的頒布導致政權、媒體與經濟改革之間產生了新的矛盾。表面上新聞檢查制度取消了，國家不再直接監管媒體，但實際上中央政府與企業都可以以股份的形式直接經營與管理媒體事業，而由於媒體發展急需龐大資金，大企業經理人與銀行寡頭對於媒體的經營與管理，取代了蘇聯時期中央政府對媒體的操控。

市場競爭的經營管理團隊，在90年代初期，俄羅斯的媒體人往往不知如何與廣告市場打交道。表面上看，政府不再補貼媒體使政府減輕了經濟負擔，但後果是葉利欽總統經常直接面對來自媒體人的不信任感，因為在媒體人最需要政府的時候，政府卻拋棄了他們。

在前蘇聯解體之前，就已有專業評論性報紙存在，例如《獨立報》。儘管該報在90年代初期銷量不高，但由於其政治評論切中時弊，故影響深遠。前蘇聯解體之後，金融寡頭別列佐夫斯基 (Boris Berezovsky) 馬上注入大量資金到《獨立報》，之後該報總編特里吉亞科夫 (Vitali Tlegiyakov) 與編輯們寫出的文章經常讓政府頭痛不已，現在《獨立報》已經成為俄國知識份子的主要消息來源。1992年俄前總理蓋達爾 (Yegor Gaidar) 為使經濟制度迅速向市場經濟轉軌，實施休克療法，導致盧布大幅貶值，紙張變得異常昂貴，報紙的訂閱陷入停滯狀態。不過，自從普京 (Vladimir Putin) 執政後，國家已經控制了九成以上的印刷廠，這使政府有足夠資金來執行媒體商業化與國家化的政策，並穩定印刷品價格。

《俄羅斯媒體法》同時賦予政府一道撒手鐮——停止媒體經營事業的權力，這使得俄羅斯媒體的發展與政府在某些方面達成默契。葉利欽執政期間並沒有屬於自己的政黨，因此他當時要依靠金融工業集團的支持，以抗衡俄共的強大勢力，如此逐漸形成魚幫水、水幫魚的利益共同體，媒體這時也形成分別圍繞在政府與金融工業集團兩邊的兩個派別。普京上台後逐漸擺脫金融工業集團與媒體大亨的政策綁架，政策制訂多由國會第二大黨團結黨護航，其他黨如右翼聯盟、自民黨、無黨籍議員也大都支持政府，2002年前夕，杜馬第二、三大黨「團結黨」與「祖國全俄羅斯黨」結盟合併，更確定了今後國會將更順暢地執行總統的政策。此時，媒體逐漸修改了尖銳批評政府政策與為寡頭護航的策略，對於政府的政策進行兩分法的分析，即國家政策內外有別。基本上，媒體對於政府執行的國內政策，會以專業與國家兩種角度切入，進行分析報導與建設性的批評，對於外交政策則完全以國家安全的角度進行報導與分析。

《俄羅斯媒體法》賦予政府一道撒手鐮——停止媒體經營事業的權力，這使得俄國媒體的發展與政府在某些方面達成默契。葉利欽執政期間，媒體圍繞政府與金融工業集團形成兩個派別。普京上台後逐漸擺脫金融工業集團與媒體大亨的政策綁架，媒體逐漸修改了尖銳批評政府政策與為寡頭護航的策略。

二 媒體成為政府與社會和睦的潤滑劑

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系主任扎蘇爾斯基 (Yassen Zassoursky) 認為，在前蘇聯解體後近十年的俄羅斯媒體發展過程中，國家、社會、立法系統還沒有形成一個理想的互動關係，在此，扎蘇爾斯基更加強調公民社會的作用。他認為理想的公民社會對國家發生的任何意外事件都會泰然處之，並不斷與政府進行有效的合作，使政府的改革能不斷進行下去^④。

扎蘇爾斯基擔任新聞系系主任近三十年，很多媒體人都是他的學生。他在課堂中提到，90年代改革初期，由於蓋達爾與左派的激烈鬥爭，社會多數人的利益受到重大打擊，媒體人因而產生了不信任政府的心態。切爾諾梅爾金 (Viktor Chernomyrdin) 就任總理後，總統葉利欽開始在左右兩派之間採取妥協，

因而在重大經濟與政治改革當中，幾乎看不到葉利欽的任何改革主張，他本人的政見基本上是通過總理間接表達出來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的不徹底性自然而然表露無遺，最後人民再次承擔政策失誤的後果，長期動盪、左右搖擺的政策無法使人民對政府產生信任，俄國公民社會自然也無法有效建立起來。

在普通俄羅斯人的思維中，國家等同於政府或警察一類行政機關，這使得俄羅斯人對於國家的理解相當有限與片面，媒體在行使監督權時，也有被人民誤解為有濫用權力的傾向。

扎蘇爾斯基認為，具有法治化或制度化的電視台最有利於俄羅斯電視媒體的發展^⑤。如何建立法治化的媒體，仍然是擺在現任總統普京面前的問題，過去前蘇聯是依靠媒體扮演政黨的喉舌，統一各族人民的思想，這對於當時的經濟發展具有正面且積極的意義。在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宣布蘇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發展高級階段之後，媒體如何在改革的道路上繼續發揮喉舌的作用，成為當時新聞界研究的主要課題，但前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卻沒有嚴把這一適用於前蘇聯各個政治時期的政治理念，媒體最終成為分裂國家的重要因素。

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媒體如何與政府相處？這是俄羅斯媒體人現在經常思考的問題。媒體是作為第四權來監督國家政府，還是成為政府的喉舌？對此普京的具體行動是：在國家的重大問題上堅持媒體為政府服務的原則，但對於一些具體的經濟改革措施，媒體原則上可以參與進來。扎蘇爾斯基認為法國媒體的發展值得參考，事實顯示，葉利欽在執政後期基本上採用了一些法國模式，如建立國家所有的「文化電視台」及加強「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委員」對各大電視台的監控。然而，與法國媒體相比，現時俄國政府所做的還相當膚淺^⑥。

迄今為止，法國的廣播電視體制基本為國家所有、政府控制及企業融資三種形式相結合。在第四共和與第五共和時期，法國的廣播電視台常被人稱為國家的工具，但這為戰後法國的經濟穩定與國家管理正常化立下了汗馬功勞。在80年代，法國在擺脫戰後的陰影與左右派激烈鬥爭的局面之後，廣播電視體制發生了劇烈變化。現在，法國的廣播電視台所有制形式與國家政治左右的基本情況，與俄羅斯媒體的現狀有着驚人的相似。

法國的廣播電視早期屬於公營和私營相結合的混合體制，最初廣播與電視系統的播出需要依靠部隊的無線電視系統與郵電系統的配合，法國政府其實早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開始從埃菲爾鐵塔播出節目。1919年，法國政府將管理無線電話的責任交給郵電部，第一座真正的廣播電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廣播設備製造公司 (CSF) 設立的，1920年廣播設備製造公司的子公司——無線電公司領取營業執照，開辦電台，哈瓦斯通訊社投入了部分資本，業餘無線電愛好者開始付費點播。

1945-70年期間，法國進入了第四、第五共和國時期，廣播電視體制開始採用政治訓導的方式。在剛解放不久的法國，所有私營電台都被撤銷，1945年11月，政府發布命令，建立法國唯一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法國廣播電視局 (RTF)，

在俄羅斯人的思維中，國家等同於政府或警察一類行政機關。在進行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媒體如何與政府相處？是作為第四權來監督國家政府，還是成為政府的喉舌？對此，普京的具體行動是：在國家的重大問題上堅持媒體為政府服務的原則，但對於一些具體的經濟改革措施，媒體原則上可以參與。

法國廣播電視台的台長由政府內閣任命，並向情報信息部長述職。根據民法的規定，從事國內的廣播電視服務，廣播電視台的撥款來自於議會表決。

1958年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上台執政之後，法國廣播電視的發展形勢基本上確定下來，戴高樂對廣播電視下達的第一個決定就是：在情報部門下設立廣播電視局^⑦。這基本上確定了廣播電視的發展必須接受國家管理這一基本方向。戴高樂認為：廣播電視對政府非常重要，它是政治鬥爭中永不乾涸的源泉。戴高樂非常重視廣播電視，他曾經為了準備電視演播而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排練，他在面對鏡頭時，還精心挑選電視記者及攝影記者，當然這與戴高樂的反對派掌握大部分印刷媒體有相當的關係。

在蓬皮杜(George Pompidou)時代，法國廣播電視開始多元化，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執政後開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多元化。1969年就任總統的蓬皮杜認為，改革廣播電視是重要和迫切的。他最初採取了一種平衡政策，傾向於讓技術部門去管理廣播電視，並撤銷了情報部門。這基本上屬於蓬皮杜的一些緩靖政策。1972年，情報部再次建立起來，新的法國廣播電視公司(ORTF)又再次列為政府管理的範圍。

1981年，社會黨在選舉中獲勝，密特朗擔任總統，同年他批准了一份建議進一步分離政府與媒體的報告，根據這一建議，從國家的不同機構挑選出九名成員組成高等委員會，具有監督預算及規範所有廣播電視經營者的權力。這項決定的缺點在於：許多親政府的認識也被塞進廣播電視的高級位置。80年代，法國在經濟發展上有一明顯的共識，就是國家經濟發展必須同新技術掛鉤，法國人認為也只有這樣才能在同日本的競爭中領先。密特朗在這方面是真正的行家，早在1950年代他任職情報部長時就通過決定：提高法國國內電視台的發射質量，使電視掃描線達到819條。該決定鼓舞了當時工程師們科研開發的激情，但不好的後續效應卻是：過高的發射質量變相阻止了法國電視輸出國外，同時國內電視的價格也變相提高了。1981年之後，法國除了政府控制的三個電視網之外，又增加了一個半公共的付費電視超級頻道(這一頻道又稱為「新頻道」、兩個商業性的電視網和數百家獨立的私營電視台——其中許多是非法電視台，後來才得到批准。

法國官員在執行廣播電視改革的同時，還堅持廣播電視須維護法蘭西語言和文化的獨立與特權地位。在法國的積極倡議之下，歐共體決定今後歐洲的有線電視要有65%的節目來自於歐洲。

1982年由專家組成的委員會提出報告並通過了《視聽傳播法》，制訂該法的基本理念是：法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基本大方向不變，但政府與媒體之間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公關性質的關係，媒體這時成為政府與社會及公民之間溝通的最佳、最有效渠道。

法國在戴高樂時期成立的廣播電視局與後來葉利欽組織成立的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委員有異曲同工之妙。1991年8月21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頒布《關於俄羅斯聯邦大眾媒體的命令》，該法令把前蘇聯廣播電視公司和全蘇第二電視頻道

法國的廣播電視早期屬於公私營相結合的混合體制。戴高樂上台後，對廣播電視下達的第一個決定就是：在情報部門下設立廣播電視局。他認為：廣播電視對政府非常重要，是政治鬥爭中永不乾涸的源泉。在蓬皮杜時代法國廣播電視開始多元化，密特朗執政後才開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多元化。

移交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委員會管理，該委員會當初成立的使命，是為了突顯俄羅斯聯邦在蘇聯的突出地位。

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委員會成立的宗旨在於^②：

1、建立統一的技術製作系統，防止廣播電視台各自為政，影響整個俄羅斯廣播電視業的技術提升。俄羅斯作為歷史悠久的大國，媒體應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並保留俄羅斯固有的優秀傳統，而不能堅持商業贏利為節目的最終趨向。

2、協調政府與媒體間的關係。現在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文化電視台、俄羅斯廣播、馬雅可電台、奧爾菲電台、俄羅斯之聲電台基本上已經成為政府執行政策的喉舌，俄羅斯的地方廣播電視台經常出現一個地方只有一個廣播電台、一個電視台的尷尬現象，政府要通過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委員來加強地方廣播電視台的建設。

3、委員會有義務建立新聞資源的統一應用。委員會鼓勵各電視台盡量使用俄羅斯通訊社的評論與新聞，以節省俄羅斯有限的資源。

4、在技術改造方面要盡量統一標準，以便於國家現代化的進程。

5、委員會應當為廣告技術的改造與發展提供更好的外部環境。電視台、廣告商與國家的各個部門應互相協調，以提高廣告的運營效率。

全俄廣播電視委員會成立的目的在於：委員會基本執行政府對於媒體的整體垂直性的結構管理，主要控制全俄廣播與電視節目的製作與發射。因為該委員會控制着全俄羅斯唯一的電視發射塔——奧斯坦丁電視塔以及各地的轉播站及衛星系統，各廣播電視台在節目製作好之後都會自覺地接受委員會的新聞審查。

1998年，在俄羅斯發生金融危機之前，5月8日，總統葉利欽下達關於如何加強國家控制電子媒體的總統令，同時白宮下達有關調整國家電子媒體運作的政府令。這兩個文件主要集中體現一個思路，就是成立國家形式的「控股公司」，其目的在於以一種半政府、半商業的形式控制電子媒體，但由於8月底俄羅斯發生金融危機，這一調整媒體管理形式的改革計劃並沒有完全施行。這個思路後來在普京執政時期得到更加確實的落實，而普京的手段更為隱蔽，普京在各家電視台與新聞社的周圍鼓勵與支持成立一些小的新聞社，或親普京的新聞媒介單位，這樣，一旦電視或報紙有任何反普京的言論，馬上就會有很多平面媒體發出大量相關新聞，那麼對於政府的負面新聞就會淹沒在整個信息海洋之中，這是以柔性手段來控制反對言論。

法國在戴高樂時期成立的廣播電視局與後來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組織成立的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委員有異曲同工之妙。該委員會的使命是為了突出俄羅斯聯邦在蘇聯的突出地位。1991年8月21日，葉利欽頒布法令把前蘇聯廣播電視公司和全蘇第二電視頻道移交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委員會管理。

三 人治大於法制

恰好在蘇聯解體前夕，《俄羅斯出版法》問世，曾經是前蘇聯出版部部長的費多托夫 (Mikhail Fedotov) 認為：葉利欽對於大眾傳播媒體的態度可以說是家

長式的，確切地說是父親式，當然這種態度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葉利欽本人受的是前蘇聯制度的教育，並接受了帶有舊官僚式的新聞觀念，即新聞就是集體鼓動者、集體宣傳者和集體組織者；作為黨的幹部，他非常清楚新聞記者是黨的助手，他擔任蘇共莫斯科市委書記時，對報界的態度是由他決定刊登甚麼，而且只能登他認為重要的東西。費多托夫是前蘇聯《出版和其他大眾傳播新聞媒體法》的創始者之一，該法律承認新聞工作團體有成立媒體公司的權利，並宣布每個編輯部都是獨立法人，這意味着新聞傳播媒體已經獲得部分自由的權利，但該法律的缺點在於沒有明確規範新聞媒體在經濟發展中應負的義務和如何利用來自國外的投資，以及國家如何管理媒體的金融運作。

葉利欽對於大眾傳播媒體的態度，確切地說是父親式的。葉利欽受的是前蘇聯制度的教育，並接受了帶有舊官僚式的新聞觀念，即新聞就是集體鼓動者、集體宣傳者和集體組織者；他擔任蘇共莫斯科市委書記時，對報界的態度是由他決定刊登甚麼，而且只能登他認為重要的東西。

費多托夫在回憶中講到：在那個時期，中央政府為減少州和邊疆區報紙的影響，出版部說服葉利欽，有必要建立幾十種可以馬上在一些毗鄰的自治區或州發行的報紙，同時，出版部應與新聞工作者團體，在某些情況下與其他組織一起，充當報紙的合創者。但許多報紙在創立初期由於時間太倉促，沒有制訂商業計劃與市場調查，結果在一兩年之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事實表明，在經濟改革期間，許多媒體在資金管理上茫無頭緒，只會完成上級委派的政治任務，但管理上的鬆散與自由性，卻使這些政治任務無法完成。

1990年，葉利欽媒體改革的總顧問波爾托拉寧(Bortolalin)在名為《辦人民的電視》的文件中提到：為了適應民主改革，俄羅斯需要建立一個完全新型的電視公司……這裏的涵義既大膽又簡單，就是要與人們熟悉的蘇聯國家電視台競爭。葉利欽積極採納了這一建議，並在兩次電視採訪中解釋道：它應當是另一種電視，它應當維護社會的利益，批評政府，並公開報導政府及最高層官員的事件^⑨。葉利欽一直認為報刊、電視對於自己的忠誠是某種客觀事實，是對他在1991年8月所作的貢獻的自然回報，但葉利欽不信任一些有影響力的著名記者，認為「他們曾經為戈爾巴喬夫賣過力，疑心重重和『記性好』明顯害了葉利欽，但他無法克服」^⑩。

1991年8月之前，在民主派中間經常聽到這樣的議論：把電視、廣播、報紙給我們，我們就能提高人們對改革的支持度。八月政變失敗之後，大眾新聞媒體充滿了民主主義的奢侈安樂和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情緒。1993年3月20日葉利欽簽署了第377號《關於保障新聞穩定和對電視廣播要求》的總統令，總統令對於新聞市場、自由觀點、新聞平衡、職業責任、電子生態、信息保護等分別提出具體要求，當中還強調：大眾新聞媒體和權力機關在其相互關係中應遵守《大眾新聞媒體和人權宣言》(歐洲委員會憲法大會70年第428號決議)、廣播電視管理原則(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1975年第748號建議)、大眾新聞媒體與議會關係原則(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1984年第820號決議)。這一總統令反映了葉利欽與最高蘇維埃之間就着電視問題的激烈鬥爭，加強了電子媒體的獨立法律基礎。

1993年，葉利欽支持的記者保護基金會主席西門諾夫(Aleksei Simonov)開辦大眾新聞法律學校，該校招收的是法學專業的學生，學校各系還有日間部與

夜間部之分。該校的特色之一就是沒有大眾新聞法學科，學校主管是當時已經成為總統助理的巴圖林(Yuri Baturin)。該校位於記者保護基金會所在大樓旁邊，部分資金來自美國記者基金會，學生還經常可以免費到美國實習。

西門諾夫在2000年於聖彼得堡舉行的、名為「公民控制」的國際會議上清楚表明：國家電視台在俄羅斯存在是完全無意義的。西門諾夫的觀點基本上代表了美國媒體對俄羅斯的完全滲透，因為除美國之音外，美國其他媒體皆為美國各個財團所有。可以看出，西門諾夫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記者的基本自由權利。2000年8月，俄羅斯核潛艇庫爾斯克號在巴倫支海峽意外沉沒，西方與俄羅斯圍繞救援行動暗暗較勁，當時俄國媒體對此也進行了全面報導，筆者專門採訪了西門諾夫，從採訪中我們發現，西門諾夫基本上代表着大多數新聞媒體人的思路^①。西門諾夫認為在經濟改革之後，俄國媒體已經出現一個專業媒體人階層。

四 俄羅斯專業媒體人與寡頭

1994年，金融寡頭別列佐夫斯基通過葉利欽身邊的人，說服葉氏簽署改變俄國社會電視台(ORTV)股份結構的命令。儘管公司法規定國家在公司的資本結構中佔有51%的絕對優勢，但政府還是變相失去了對公共電視台的控制，因為別氏可以藉着配股方案和股東大會通過的各項具有決定性的決議改變股份結構。

伴隨着政治鬥爭的信息戰浪潮不斷推進，以及私營媒體帝國之間無休止的鬥爭，1997年總統葉利欽把俄羅斯最大的私營企業與銀行家們請到克里姆林宮，要求他們停止在廣播電視節目中相互誣衊造謠的行為。事後葉利欽在回憶錄《總統馬拉松》(*Prezidentskii Marafon*)一書中提到，前蘇聯時期的媒體由中央控制，現在已經轉型為直接受商業寡頭控制，這意味着國家及總統失去了對媒體的直接控制，總統與政府對人民的影響力必須借助寡頭才能充分發揮。基本上葉利欽的個性是：只要不受到過份進攻，或他自己及其政權並非處於極為不利的境況時，他總採取觀望的態度，這也說明其在總統任內這幾年間為甚麼不反對大眾新聞的自由化。

另一金融寡頭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在1996年之後已經擁有的媒體涵蓋電視、廣播、報紙及雜誌，「獨立電視」與「獨立電視衛星台」是古辛斯基媒體帝國的標誌，「回聲廣播電台」則以其犀利的實時分析贏得莫斯科市周圍廣大地區居民的喜愛。《七日電視周刊》與《今日報》也是古辛斯基重點培養的對象，這是因為古辛斯基電視媒體的影響力一般只及烏拉爾山脈以西的地區，即俄羅斯聯邦的歐洲區，而「回聲電台」為調頻立體聲電台，覆蓋範圍一般在莫斯科的周邊地區；相較之下，報紙的行銷通路卻可遍及整個聯邦，而且俄羅斯人有閱報的習慣，因此報紙的影響要遠大於其他媒體。

1997年葉利欽把俄羅斯最大的私營企業與銀行家們請到克里姆林宮，要求他們停止在廣播電視節目中相互誣衊造謠的行為。事後葉利欽在回憶錄中提到，媒體現在已經轉型為直接受商業寡頭控制，這意味着國家及總統失去了對媒體的直接控制，總統與政府對人民的影響力必須借助寡頭才能充分發揮。

別氏的經營思維是通過控制媒體以獲取政治利益，別氏主要控制俄國第一大電視台社會電視台、政論報紙《獨立報》、百年歷史的《火炬》雜誌及與美國媒體合資的第六電視台。1996年12月之前，別氏只擁有社會電視台的4-5%股份，別氏主要是通過旗下伏爾加汽車集團的融資來控制社會電視台的。

在1996年葉利欽贏得大選之後，古辛斯基行事還十分低調，很少在大媒體上曝光，但從後來事態的發展上看，古氏對於俄羅斯的影響的性質與別列佐夫斯基是完全不同的。古辛斯基對於其在俄羅斯的媒體投資沒有太大的安全感，因而在俄投資的同時，還把大量資本移到英屬直布羅陀與塞浦路斯。俄羅斯檢察署事後加以調查，發現古氏與美國的猶太集團及以色列有密切聯繫，後來「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報導古辛斯基還持有以色列護照。對普京政府而言，古辛斯基的投資方式與媒體的經營管理已經威脅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

1997年1月27日，古辛斯基成為橋媒體的總經理，擁有橋媒體的70%股份，其餘則由橋媒體三大媒體專業人——馬拉申科 (Igor Malashenko)、基辛廖夫、達布拉耶夫 (Dabulaev) 及部分小股東持有。

古辛斯基的這種媒體經營方式，成功為俄羅斯媒體培養出一批專業媒體人，這批專業媒體人的特點是以美國式的新聞理論為基礎，其管理更加強調德國式的團結，在對外政策上以反戰為主，注重政府的民主建設，缺乏與政府同甘共苦的精神，當政府遇到困難時，這些專業媒體人經常表現出清高與中立的立場，馬上與政府劃清界限。

1993年獨立電視台剛誕生時只有兩個節目：半小時新聞節目〈今日〉與基辛廖夫主持的〈總結周評〉；1994年古辛斯基開始對獨立電視融資，同年《今日報》編輯把自己的股份賣給古辛斯基；95年橋銀行開始投資「回聲電台」；96年古辛斯基成功為葉利欽進行了總統大選之後，獨立電視台取得了第四頻道。原來獨立電視台是與俄羅斯教育電視台共同分享第四頻道，96年之前的獨立電視台只有三大王牌節目，它們分別是〈今日新聞〉、〈今日人報導〉、〈總結周評〉，其他時間一般只播放一些經過粗略翻譯的美國電影，收看效果非常差，常常在聽到俄語的同時，也聽到聲音很大的英語，而且沒有附加任何字幕，前蘇聯的電影基本上已經看不到了。97年，獨立電視台的觀眾已升到一百萬之譜，同年成立的獨立衛星電視台已經吸引了三萬多個家庭，這些家庭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彼得堡、葉卡捷琳堡等地。98年，古辛斯基還有意發射價值1.3億美金的電視轉播衛星，屆時獨立衛星電視台將會有五十個以上的電視頻道。

在這段發展期間，古辛斯基並非完全不干預政治，因為古辛斯基對於沒有政治回報的活動不感興趣，他的任何行動基本上都是能獲得利益的。97年，獨立電視台詳細報導了卡拉斯納亞爾斯克鋁廠的股權之爭，認為這場股權之爭實際上是原來的領導與所謂馬匪進行的鬥爭，後來葉利欽在輿論壓力下，對所謂的馬匪進行了整肅。其實當時俄羅斯百姓對於馬匪的了解僅限於新聞報導，並沒有真正見過所謂的馬匪，也不了解馬匪經濟的真正含義。不可否認，在俄羅

金融寡頭古辛斯基為俄羅斯媒體培養出一批專業媒體人，這類媒體人的特點是以美國式的新聞理論為基礎，其管理更加強調德國式的團結。這些媒體人在對外政策上以反戰為主，注重政府的民主建設，缺乏與政府同甘共苦的精神，當政府遇到困難時，經常表現出清高與中立的立場，馬上與政府劃清界限。

斯經濟當中確實存在所謂的影子經濟，鋁廠股權之爭實際上是原國營經理人與俄經改受益人之間的鬥爭。

1996年底在古辛斯基與別列佐夫斯基周圍形成了一個新的階層，就是俄羅斯媒體專業人。其實這一階層的形成並非偶然，在92年前蘇聯解體之後，葉利欽執行的經濟改革就一直為人詬病，蓋達爾的莽撞和切爾諾梅爾金的舊官僚氣息都是葉利欽不能原諒的，前蘇聯遺留下來的舊媒體人基本上是以一種開放的思維與舊式的報導方式來記錄這段歷史，葉利欽急需一批能夠理解自己改革的媒體人，儘管這批媒體人不太聽話，但葉利欽認為他能控制住這些人，因而無論是平面媒體的產權轉移還是電視媒體的成立，葉利欽都在立法上大開方便之門，比如按照葉利欽頒發的媒體管理條例，成立雜誌僅需時一星期，報紙要一個月時間審批，電視台則需要三個月。

前蘇聯遺留下的老媒體人基本上在96年之前已經盡數退出媒體報導一線，除了現在還活躍於社會電視台的符拉基米爾—鮑斯那(Bozna)外，人們原來熟悉〈七日節目〉中的吉哈米羅娃(Jihamilova)、〈半夜前後〉的茅洽諾娃(Mochalova)等等已經不見了。

五 俄羅斯傳媒的國家化與專業化

2000年5月份，古辛斯基被檢調機關依法逮捕，數月之後他與另一名呼風喚雨的媒體大亨別列佐夫斯基分別流亡西班牙與法國。這引起俄羅斯媒體與外國學者的廣泛注意，作為第四權的媒體究竟應向何處發展？總統普京將以何種方式來經營兩名大亨留下來的媒體？畢竟古辛斯基所領導的獨立電視台是全俄國最賺錢的電視台，另外旗下的莫斯科回聲電台也是俄羅斯歐洲區最有聲望的政治電台。

這次普京在國情咨文透露出這樣的政治信息：俄羅斯政府將要從葉利欽時代的各自為政，逐漸轉型為一個有效率、具遠見的行政團隊，這支團隊為垂直結構管理，有別於前蘇聯僵硬的垂直管理。近期宣傳部長列辛(Mikhail Lesin)對媒體的整頓，基本上是普京落實行政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次整頓卻引起俄羅斯精英階層的廣泛注意，精英階層現在更加在意普京是否會重拾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進而損及精英階層的政治與經濟利益。

從現今普京所採取的政策來看，在執行層面上還算平和。首先，普京大體上沿襲了古辛斯基讓媒體專業人士管理電視台的老辦法，基本上保證了媒體不會成為國家經濟的負擔。俄羅斯國家天然氣工業總公司接手獨立電視台之後，沒有派駐大量公司內部人員進入電視台；反之，進入電視台的都是俄羅斯國家電視台的業務骨幹及從獨立電視台離隊的記者與主持人。現任獨立電視台第一副總經理庫里利斯基科夫(Kulisjikov)是其中之一，他1996年任獨立電台〈今日焦點〉的主持人，同時也主持整點新聞，2000年成為獨立電台的副經理，但因與古辛斯基理念不合而於10月離職。

普京透露：俄羅斯改革將要從葉利欽時代的各自為政逐漸轉型為一個有效率、具遠見的行政團隊。他大體上沿襲讓媒體專業人士管理電視台的老辦法，基本上保證了媒體不會成為國家經濟的負擔。其次，普京還加強了中央媒體對周圍地區的輻射作用。迄今為止，許多俄國媒體人對普京的媒體改革路線還保持高度的懷疑與反對。

其次，普京還加強了中央媒體對周圍地區的輻射作用。自前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地區媒體的發展基本上處於失控狀態，由於媒體高投入的特性，中央級財團很少光顧地方媒體，這使得地方媒體成為各州州長喉舌，在地方報紙上首先看到的，會是地方首長的講話。今年國家杜馬通過的預算當中，向地方廣播電視局的撥款已經升至9,000萬美元，幾乎是去年的一倍，這樣基本上會恢復中央對地方媒體的直接管理。

迄今為止，許多俄國媒體人對普京的媒體改革路線還保持高度的懷疑與反對。前獨立電視台總經理、現任第六電視台總經理基辛廖夫就在自己主持的節目中反覆指出普京媒體政策的獨裁傾向。這場媒體改革爭論的焦點，在於普京以媒體專業化為手段，在法制的基礎上實現媒體為國家服務的宗旨，普京的理由就是俄羅斯現時還很虛弱，國家需要集中力量進行建設，使國家上下形成一個有效率的機體。基辛廖夫則更加強調現今媒體專業化是實現媒體作為第四權的必要保障。

這場爭執的另外一個焦點是，基辛廖夫掌控的第六電視台幾乎集中了俄羅斯電視界的所有新聞精英，造成宣傳部長列辛在執行國家宣傳計劃時總有一種力不從心之感。當然這不可否認也與列辛本人的能力有關，列辛出身軍人家，畢業於俄羅斯建築工程學院熱力能源系，直到1987年才開始接觸媒體，1996年葉利欽大選時他才開始顯露才華，當時主要負責選舉的文宣工作。許多俄羅斯媒體人都抱怨列辛在執行國家政策時，許多表現都像一個工程師或政客。

現在第六電視台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由俄羅斯最大的石油公司魯克石油總裁阿列克佩羅夫 (Vagit Alekperov) 控制着的40%左右股份；另一部分就是由基辛廖夫成立的非盈利性組織「媒體—社會智能」掌握，儘管「媒體—社會智能」佔有的第六電台股份非常少，但他卻牢牢地團結了第六電台的大部分記者。在這場媒體鬥爭中阿列克佩羅夫基本上持旁觀的態度。

宣傳部長列辛最近利用手段使第六電視台陷入危機之中，他首先想方設法迫使第六電台的一個小股東 (佔7.8%股份) 「國際統一機械工廠」退出股份，同時列辛以新近在杜馬中通過的有關媒體的法案，迫使「媒體—社會智能」退出第六電台。列辛對第六電台所採取的強勢行動，反映出俄羅斯媒體一個存在已久的問題，這就是畢業於莫斯科大學、及後在媒體工作的「理論派」與半路出家的「國家派」在媒體發展上的鬥爭，「理論派」基本上沿襲莫大新聞系的思路，強調媒體作為第四權的職能作用，「國家派」則更加注重國家領導的施政方針。

從媒體的表面炒作來看，普京與基辛廖夫的爭執似乎已經很激烈了，其實這至多算是內部問題，與寡頭問題有着本質的區別，直至現今基辛廖夫還是總統重要智庫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的委員。該委員會成立於1992年，是由著名政治家、企業家、國家公務員及強力部門官員組成的非政府組織，曾經參與制訂《俄羅斯戰略》、《俄羅斯戰略—2》、《俄羅斯戰略—3》等重要的戰略報告。

俄羅斯媒體有一個存在已久的問題，這就是由莫斯科大學畢業的「理論派」與半路出家的「國家派」在媒體發展上的爭鬥，理論派強調媒體作為第四權的職能作用，國家派則更加注重國家領導的施政方針。媒體人現在面臨的是來自兩個階層的爭鬥，一個是特權階層，另一個就是現在還可自由表達意見的階層。

俄羅斯著名新聞評論家芝維列夫 (Zvilev)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一語點破：媒體人現在所面臨的不是黑與白的問題，而是來自兩個階層的爭鬥，一個是特權階層，另一個就是現在還可自由表達意見的階層。

看來普京在這場媒體整頓當中還會堅持一切以法律為優先的原則，任何大國的發展一般都需要一定的延續性，因而普京的政策一般都會延續葉利欽所制訂的法律，普京會在媒體的專業化與國家化之間有一定的取捨，而媒體法制化是他必走之路。

註釋

- ① 1993年9月21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宣布終止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與最高蘇維埃的立法與監督職能，停止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1993年10月8日，俄羅斯中央官方報紙《俄羅斯報》公布了《1993年俄羅斯聯邦聯邦會議國家杜馬選舉條例》，按照該條例的規定，1993年12月17日俄羅斯聯邦選舉產生了首屆國家杜馬。1993年12月25日俄羅斯聯邦現行憲法公布生效後，按照俄羅斯聯邦憲法規定，1995年6月通過了《俄羅斯聯邦聯邦會議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第二屆聯邦會議國家杜馬代表於1995年12月17日選舉產生，以後各屆國家杜馬代表也將按法規定直接選舉產生。
- ② 1993年10月8日，俄羅斯中央官方報紙《俄羅斯報》公布了《1993年俄羅斯聯邦聯邦會議聯邦委員會選舉條例》，1993年12月首屆聯邦委員會按規定選舉產生。1995年12月，按照憲法規定通過了《俄羅斯聯邦聯邦會議聯邦委員會組成程序》，第二屆與以後各屆聯邦委員會將由八十九個聯邦主體各派兩名代表組成。
- ③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二十九條。請參閱 *Правовое Поле Журналиста* (記者法律總覽) (Moscow: Славянский Диалог (斯拉夫對話出版社), 1997), 95。
- ④ Yassen Zassoursky,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л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СМИ угрозу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俄羅斯媒體是否對於社會構成威脅), *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 (俄羅斯記者雜誌), January 1998。
- ⑤ 2000年9月30日-10月1日，「公民控制」(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座談會，會議地點：聖彼得堡，協作單位：國際傳媒學院(奧地利)、美國駐聖彼得堡領事館、波羅的海媒體中心。
- ⑥ 2000年9月30日-10月1日，「公民控制」座談會。
- ⑦ Euromedia Research Group, *The Media in Western Europe. The Euromedia Handbook*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 ⑧ 國家杜馬政治信息聯繫委員會主席菲尼克 (O. A. Finiko) 與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委員會主席什維德科夫 (M. E. Sveidkov) 於1999年4月6日共同發表的聲明。
- ⑨ O. Babov, *Тревожные сны царской свиты* (沙皇侍從驚醒) (Moscow: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ршенный Секрет [完全機密出版社], 2000), 101-102。
- ⑩ 格·薩塔羅夫 (G. Satalov) 等著，高增訓等譯，葉軍等校：《葉利欽時代》(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頁607-608。
- ⑪ 吳非：〈俄傳媒如何看庫爾斯克號事件？——訪記者保護基金會主席西門諾夫〉，《聯合早報》，天下事版，2000年8月26日。

吳非 莫斯科國立大學社會傳播學博士，現任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後研究(俄羅斯傳媒)、福建新聞學會常務理事、前蘇聯、俄羅斯傳播研究中心主任。